

論析台灣世界語雜誌《La Verda Ombro》 中的愛羅先珂作品

呂美親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台灣世界語學會機關雜誌《La Verda Ombro》（綠蔭）中刊載的俄國盲人作家愛羅先珂的3篇作品為分析主軸，考察愛氏作品於台灣、日本、中國的傳播途徑與前後的著作權糾紛過程，進而理出世界語及其緊密的連繫網絡，乃為1920年代初期東亞知識分子交流的一個重要管道；並提出愛羅先珂作品於《La Verda Ombro》的刊載，除了可見當時的台灣世界語者對世界潮流與東亞脈動的觀察之敏銳，也流露出編者如連溫卿，與日本及中國進步的知識作家有著類似的、對於俄國及當時代左翼思潮與文藝的憧憬。這些作品的刊載與其意義，也應在台灣文學史上記上一筆。

關鍵詞：世界語、台灣世界語學會、《La Verda Ombro》（綠蔭）、愛羅先珂、連溫卿、胡愈之

* 本論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建議，謹此致謝。

An Analysis of Vasilij J. EROŠENKO's Works in Taiwan Esperanto Magazine *La Verda Ombro*

Lī Bī-Chhin

Contra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works of the Russian blind writer, Vasilij J. EROŠENKO, published in *La Verda Ombro* (*Green Shade*), a magazine of Taiwan Esperanto Association.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spreading way of Vasilij J. EROŠENKO's literary works in Taiwan, Japan and China,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copyright dispute so as to sort out its close network with Esperanto,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East As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1920s. Moreover,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Vasilij J. EROŠENKO's works in *Verda Ombro* not only shows the acute sensitivity of Taiwan Esperantists' observation of world trend and pulsations in East Asia, but also reveals that editors such as Lian Wen-Ching, who are similar to Japanese and Chines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writers, had visions for Russian and left-wing's trend and literature and art. The publ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works should also be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Keywords: Esperanto, Taiwan Esperanto Association, *La Verda Ombro*, Vasilij J. EROŠENKO, Lian Wen-Ching, Hu Yu-Zhi

論析台灣世界語雜誌《La Verda Ombro》 中的愛羅先珂作品

一、前言

由台灣世界語學會於1919年至1926年發行的雜誌《La Verda Ombro》（綠蔭，以下稱《La Verda Ombro》），在當時已經由世界語者之間的網絡而受到國際注目。例如，《台灣時報》自1935年2月至12月期間連載9回裏川大無的〈台灣雜誌興亡史〉，其中介紹了文藝、語學、美術、產業、工藝及科學、社會科學、宗教等各種雜誌的發行狀況及內容；¹而在語學雜誌的分類中，裏川即介紹了於台北大稻埕創刊的台灣世界語學會機關雜誌《La Verda Ombro》，以及台北世界語會機關雜誌《La Formoso》（台灣）這兩份世界語雜誌。裏川尤其提及《La Verda Ombro》這從台灣一個小角落出版的雜誌，其與世界各國交換的雜誌竟高達200種以上，可謂世界知名的雜誌。²有關日本時代於台灣發行的世界語刊物概況，³以及當時影響台灣社會運動極大的連溫卿乃此雜誌主編，為開展台灣世界語運動的重要推手之相關整理，⁴或者更詳細的台灣世界語運動史研究，⁵筆者已撰文論析，於此不再贅述；在此稍再強調的是，被譽為「台灣人的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乃於1927年才獲總督府許可而得以

1 裏川大無，〈台灣雜誌興亡史（一～九）〉，《台灣時報》183-193號，1935.02-12。

2 裏川大無，〈台灣雜誌興亡史（三）〉，《台灣時報》185號，1935.04，頁108、116。

3 請參考呂美親，〈《La Verda Ombro》、《La Formoso》及其他戰前在台灣發行的世界語刊物〉，許素蘭主編，《考掘・研究・再現——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9），頁49-74。而目前可見的《La Verda Ombro》期數計37期，總頁數約300頁，若加上散佚的期數，推測計約發行44-46期。發行狀況如下：1919年：10月號創刊 及11月與12月號（或為合併號）皆散佚。1920年：1月號、2月號、3月號、4月號、5-6月合併號、9月號、10月號、11月號、12月號（7-8月合併號散佚）1921年：3月號、4月號、5月號、6月號、7月號、8月號、9月號、10月號、11月號（1-2月號休刊、12月號散佚）。1922年：1月號、2月號、3-4月合併號、5月號、7月號、8月號、9月號、10月號、11-12月合併號（6月號散佚）。1923年：1-2月合併號、3-4月合併號、5月號、6-7月合併號、9月號、10月號、11-12月合併號（8月號散佚）。1924年：僅發行1月號及2月號。1925年：停刊。1926年：僅發行3月號。

4 請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台灣世界語運動的開展與連溫卿〉，陳翠蓮等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五集（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3.08），頁131-171。

5 請參考呂美親，〈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科博士論文，2016）。

在台灣本島發行，那麼，自1919年即發行的《La Verda Ombro》，則不僅是裏川所言在當時可謂世界知名，它在1920年代初期實有其作為思想媒介與文化啟蒙之重要性。

發行期間歷時約6年的《La Verda Ombro》，於1920年2月開始連載〈La indiĝena Legendo en Formoso〉（台灣原住民傳說），並於1923年第3、4號的合併號將此系列文章重新以「附錄」的形式刊出。此連溫卿以世界語所撰寫的〈台灣原住民傳說〉，筆者亦曾譯為中文並加以解說，也提出《La Verda Ombro》在台灣文學外譯史上的重要性。⁶另外，《La Verda Ombro》中也刊載不少世界文學，其中包括1920年代在日本及中國都備受喜愛的俄國盲眼作家愛羅先珂（Vasilij J. EROŠENKO，1889-1952）的童話。⁷於1922年7月至9月，《La Verda Ombro》3次連載被日本驅逐出境而前往中國的愛羅先珂作品〈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⁸而後又於1923年2月號及7月號以附錄的方式出版愛羅先珂的2部童話作品單行本：〈Unu Paĝeto en Mia Lerneja vivo〉（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及〈Toro por Fali〉（為跌下而造的塔）。⁹雖然我們從賴和或葉榮鐘的藏書中都可見愛羅先珂於中國出版的中譯版作品集，¹⁰但就發行時間而言，最

6 請參考呂美親，〈關於連溫卿的〈台灣原住民傳說〉〉，許素蘭主編，《經眼·辨析·苦行——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三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07），頁87-111。

7 Vasilij J. EROŠENKO：此為愛羅先珂名字的世界語拼寫方式，姓氏皆以大寫顯示。俄文名記為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шенко；英文名則記為Vasili Y. Eroshenko。

8 〈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 I La Strata Arbo〉（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I 街之樹），《La Verda Ombro》，1922.07、〈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 II Lando de Revoj〉（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II 幻想之國），1922.08、〈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 III Lando de Revoj〉（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III 幻想之國），1922.09。標題中的「Skezoj」應是「Skizoj」的誤植。此兩篇由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先驅之一胡愈之翻譯，並收於愛羅先珂著《枯葉雜記及其他》（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04）。

9 〈Unu Paĝeto en Mia Lerneja vivo〉（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La Verda Ombro》1923年1、2月號附錄、〈Toro por Fali〉（為跌下而造的塔），《La Verda Ombro》1923年6、7月號附錄。此2本單行本乃德國歷史學者Ulrich LINS（1943-）提供筆者的史料，特此致上感謝之意。Ulrich LINS於1973年出版以世界語撰寫的著作La danĝera lingvo。此書被譯成德語、義大利語、英語、俄語等多種語語，日語版為栗栖繼譯，《危険な言語——迫害のなかのエスぺラン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75.11）。

10 筆者在賴和紀念館的賴和藏書中所見，乃是由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作品集《世界的火災》及《愛羅先珂童話集》，為1924年12月發行的版本。另外，葉榮鐘藏書現由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其中的《愛羅先珂童話集》為1925年的第5版。

早將愛羅先珂作品介紹到台灣的，即是台灣世界語學會的《La Verda Ombro》雜誌。因此，本論文將詳細考察刊於《La Verda Ombro》的愛氏3篇作品，它們在日本與中國的刊出狀況與愛氏作品在台灣的傳播途徑，以此探究台灣世界語運動與日本及中國的連結線索。

二、愛羅先珂與日本、中國、台灣

以盲眼詩人之稱廣受注目的俄國作家愛羅先珂，生於俄國一座名為歐布克夫卡（Obukhovka）的小鎮，4歲時因病失明，1908年畢業於莫斯科盲人學校，因緣際會學習了世界語，而後前往英國學習音樂及英語。¹¹ 1914年，愛羅先珂前往日本並進入東京盲人學校就讀，於1915年春天，與亦為世界語者的作家秋田雨雀（1883-1962）結成好友，並得到相馬黑光（1876-1955）等人的援助而從事詩文及小說的創作，且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及反戰運動，也在1916年的



Lusin (la tria de maldekstre en la unua vico) kaj V. Eroŝenko (la dua de maldekstre en la unua vico) inter membroj de la Pekina E-Asocio, je la 23-a de majo, 1922

圖1 1922年5月23日，愛羅先珂（前左二）與魯迅（前右二）於北京世界語學會合影。翻攝自侯志平主編，《中國世界語運動簡史》（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4.07）。

11 高杉一郎編譯，《エロシエンコ童話集》（日本東京：偕成社，1993.11），頁210-211。

日本世界語大會發言。世界語已極為流利的愛羅先珂，其後又前往東南亞各國旅行，卻於1919年在印度遭到驅逐又返回日本。回日後，他不僅參加社會主義同盟，也參與社會主義雜誌《種時く人》（撒種者）的籌備，於1921年第三度遭到日方逮捕並被驅逐出境。離日後，愛羅先珂前往哈爾濱與上海等地，後受魯迅的邀請前往北京，也在魯迅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引薦之下，於北大教授世界語，並以世界語講授俄國文學，期間也參與戲劇活動；《鴨的喜劇》即是魯迅懷念愛羅先珂之作。愛羅先珂於1922年也出版了第二本作品集《孤独な魂のうめき声》（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並於1923年回到俄國，在盲人學校擔任教員期間也陸續旅行世界，並持續從事創作。¹²

愛羅先珂受蔡元培招聘至北京大學任教後，在北大掀起一陣世界語旋風，其演講盛況更受到北京的《晨報副刊》、《北京大學日刊》、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半月刊《東方雜誌》等報刊的積極報導；但後來以「智識階級的革命」、「現代問題」為題進行演講時，受到政府注意甚至遭到禁止，中國官方也開始視其為危險人物。¹³

於此前後，愛羅先珂即在日本出版《夜明け前の歌》（黎明前之歌，1921.07）、《最後の溜息》（最後的嘆息，1921.12）、《人類の為めに》（為了人類，1924.10）等作品集，1923年也在上海出版世界語創作集《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¹⁴ 而由魯迅或胡愈之等人翻譯的中文版愛羅先珂著作，則包括《愛羅先珂童話集》（1922.07）、《桃色的雲》（1922）、《過去的幽靈及其他》（講演集，1924）、《枯葉雜記》（1924.04）、《世界的火災》（1924.12）、《幸福的船》（1931.03）等多部。

這位在日本及中國皆受到矚目，甚至也影響魯迅創作的愛羅先珂，¹⁵ 究竟

12 ア・ハリコウスキー著，山本直人譯，《盲目の詩人 エロシェンコ》（日本東京：桓文社，1983.09），頁212-213、317-319。

13 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 一九二〇年代 東京・上海・北京》（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89.04），頁104。

14 高杉一郎編，《夜あけ前の歌—盲目詩人エロシェンコの生涯》（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2.12），頁395-396。

15 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政大中文學報》7期（2007.06），頁178。

於何時開始被台灣讀者注意？根據本文考察，最早將愛羅先珂介紹到台灣的，正是台灣世界語學會的機關雜誌《La Verda Ombro》。而為何愛羅先珂的作品會被介紹至台灣？最大的原因應是他在當時已是日本及中國的知識界，尤其是世界語者之間爭相介紹的重要作家；另一關鍵則是，各國世界語者之間的緊密連結。

連溫卿於〈台灣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中記載U.E.A（世界世界語協會）¹⁶的支那委員S-ro Ken Wong（涓生）來台一事。據筆者考察，此S-ro Ken Wong，應是最致力於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其中一人黃尊生。¹⁷黃尊生以U.E.A支那委員的身分於1920年7月10日來台，也在台灣進行了幾場演講。而後，《La Verda Ombro》即陸續刊載來自中國方面的相關資訊，例如〈Ĥina Esperantio〉（支那世界語界，1921.05）、〈Ĥino kaj Esperanto〉（支那人與世界語，1921.07）、〈En Hinajo〉（支那消息，1922.04）、〈Movado en Hhinujo〉（支那的運動，1922.05）、〈Movado Kontraŭ Eeligio en Ĥinujo〉（支那的反抗運動，1922.08）、〈La Verda Lumo〉（綠光，1922.09）之紹介、〈Klasbatalo en Ĥina Socio〉（支那社會的階級鬥爭，1923.02）等中國的世界語運動及社會運動相關的文章。換句話說，正因《La Verda Ombro》也介紹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且透過世界語與中國產生連結，這段期間滯留中國的愛羅先珂，自然受到台灣世界語者較早也較多注目；因此，主編連溫卿就在雜誌中積極刊載了愛氏作品的世界語原文。

雖然《La Verda Ombro》於1922年7月開始刊載愛氏作品，乃起於台灣與中國的世界語者之間的連結，但早在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前，同為台灣世界語學會會員、於大稻埕設立「人類之家」收容貧民的無政府主義者稻垣藤兵衛（1892-1955），已於東京見過日本世界語之父小坂狷二（1888-1969）及

16 U.E.A（世界世界語協會），即Universala Esperanto Asocio，現多譯為「國際世界語協會」。

17 連溫卿，〈台灣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1號（1931.12），頁11。連溫卿的〈日據時期台灣ESP運動〉，《台灣風物》17卷4期（1967.08），頁53中則記為「黃雲白」。「S-ro Ken Wong」即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黃尊生（1894-1990，本名涓生），出版《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中國天津：啟明書社，1935.05）等書，亦發表〈中國與世界語問題〉（《廣州民國日報》，1926.04.07、08）等多篇世界語相關文章。而黃尊生等人組織的廣州大學世界語學會相關集會消息，也可見於《廣州民國日報》（1926.06.02）等處，新聞撰寫者署名為「K」，即黃尊生的英文名字Ken。

作家愛羅先珂，¹⁸ 因此，連溫卿得知也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愛羅先珂其人，也有可能早已透過稻垣所來；而另一個途徑則是任職《改造》雜誌的世界語者比嘉春潮（1883-1977），關於比嘉提供愛氏作品給連溫卿一事稍後詳述；但無論如何，這些線索都顯示了世界語者之間的緊密連結。

倒是，連溫卿於戰後的回憶文章裡，曾提起刊載愛氏作品而因著作權問題與中國作家胡愈之產生糾紛，¹⁹ 後由日本《讀者文摘》主編福岡誠一（1897-1975）介入調停才解決之事。²⁰ 引起著作權糾紛的是愛羅先珂哪些作品？詳細狀況又是如何？筆者先以表格方式整理愛氏刊於《La Verda Ombro》中的作品

作品名 發表處	〈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 （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Unu Paĝeto en Mia Lerneja vivo〉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	〈Toro por Fali〉 （為了跌下而造的塔）
台灣	世界語原文： 《La Verda Ombro》， 1922.07、08、09。3回連載	世界語原文： 《La Verda Ombro》，1923年 1-2月合併號附錄	世界語原文： 《La Verda Ombro》，1923年 6-7月合併號附錄
中國	①中譯：〈枯葉雜記〉，《東方雜誌》，1922.03，2回連載。 ②世界語原文：《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中國上海：上海世界語協會，1923）。 ③中譯：〈枯葉雜記〉，《枯葉雜記》（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04）。	①中譯：〈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愛羅先珂童話集》（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07）。 ②世界語原文：《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中國上海：上海世界語協會，1923）。 ③廈門語譯：《Góa Hák-hâu Seng-hoat ê Chit Toān-phian》，《廈語短篇小說 第一集》（中國廈門：廈語社，1922（原文羅馬字）。	①中譯：〈為跌下而造的塔〉，《東方雜誌》19卷1期（1922.01）。 ②中譯：〈為跌下而造的塔〉，《愛羅先珂童話集》（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07）。
日本	①世界語和日譯： 〈枯葉の物語（上海生活の童話的スケッチ）〉，《我等》7卷1-9期，自1925年1月號起連載至9月號。	①日譯：〈私の盲学校生活の一頁〉，《我等》4卷6期（1922.06）。 ②日譯：《人類の為に（為了人類）》（日本：東京刊行社，1924.10）。	①日譯：〈墜ちる為めの塔〉，《解放》5卷5期（1923.05）。 ②日譯：《人類の為に》（日本：東京刊行社，1924.10）。

18 相關考察請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台灣世界語運動的開展與連溫卿〉，《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五集，頁153-155。

19 胡愈之（1896-1986），中國著名世界語者、出版家、社會運動家，致力於中國世界語運動。五四運動時期參與《東方雜誌》編輯，1932年擔任總編輯，與魯迅等人翻譯愛羅先珂作品並介紹至中國。1933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主要著作有《胡愈之文集（1-6）》、《胡愈之出版文集》等多部。

20 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台灣ESP學會〉，《台北文物》3卷1號（1954.05），頁92。

於日、中、台三國的刊載時間，進而論析這些文章的內容，並釐清這段糾紛的過程。

三、〈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如表格顯示，愛羅先珂的〈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以下稱：童話寫生）之世界語原文，自1922年7月至9月於《La Verda Ombro》連載3回；但同年3月，由中國世界語者胡愈之中譯的版本已在《東方雜誌》連載2回，而後東方雜誌社又於1924年出版愛羅先珂《枯葉雜記》。²¹

《枯葉雜記》含序文共7節，從〈童話寫生〉內容可知即為《枯葉雜記》之〈序文〉、〈街之樹〉與〈幻想之國〉3個部分。此作品的世界語原稿是否曾刊載於中國出版的刊物，尚無法確認，但於中國出版的愛羅先珂世界語作品集《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在1923年出版，而〈枯葉雜記〉，亦即此〈童話寫生〉亦收錄於其中。²²換言之，此文原文在中國被看見的時間應較台灣晚。另一方面，日本的雜誌《我等》亦於1925年連載世界語及日語對譯的〈枯葉の物語〉之詳細版。²³那麼，可以說〈童話寫生〉的世界語原文首度刊出，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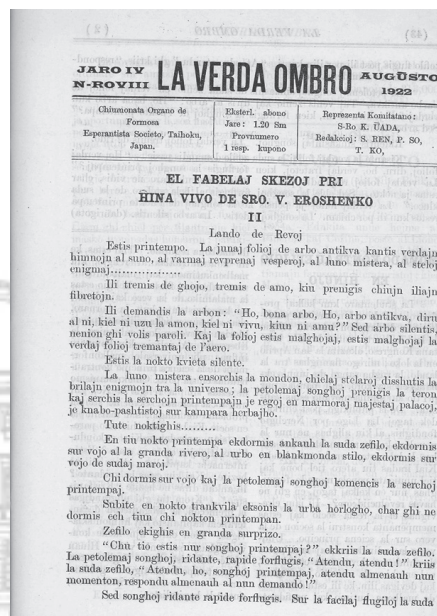


圖2 〈El Fabelaj Skezoj pri Ĥina vivo de Sro. V. Eroshenko II Lando de Revoj〉（童話寫生：關於愛羅先珂的中國生活 II 幻想之國），《La Verda Ombro》（1922.08），頁1。

21 愛羅先珂著，愉之（胡愈之）譯，〈枯葉雜記〉，《東方雜誌》19卷5-6期（1922.03.10、25），頁105-115、頁101-114。其後收錄於氏著，胡愈之譯，《枯葉雜記及其他》，頁5-13。胡愈之將此兩篇標題譯為〈街之路〉及〈幻想之國〉。

22 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エンコ全集Ⅲ》（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09-11），頁276。

23 エロシエンコ（愛羅先珂），〈枯葉の物語〉（上海生活の童話的スケッチ，世界語及日語對譯），《我等》（エスペラントの頁），1925年1月號至9月號連載，7卷1期-7卷9期。

該就是在台灣世界語學會的《La Verda Ombro》。

作為《枯葉雜記》之〈序文〉、〈街之樹〉與〈幻想之國〉3節被刊出的〈童話寫生〉，乃是愛羅先珂受魯迅之邀前往北京前，旅居上海時期的生活記錄。其中，例如〈街之樹〉一節，以樹、葉、風等自然街景作為孤獨、失望、挫敗等比喻，描寫他所見生病中的中國社會：

而在這些公園裏，却只有這個國度的百姓們沒有散步的權利；在那時候樹失望地嚷道：「阿，這百姓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呵？這國度到底怎樣了呵？這民族的壯烈的精神莫不是已死去了嗎？這國度偉大的靈魂，已永久消失了嗎？在青年們的胸膛裡的英雄的心已不再跳躍了嗎？」²⁴

這個國度的百姓失去了作為人民應有的權利，然而，樹的失望則是來自於偉大靈魂的消失，以及那些英雄之心已不再跳躍的青年。正如高杉一郎所言，此篇也是愛氏對於作為半個殖民地的中國發出的哀嘆與憤怒，所形象化的作品。²⁵ 而1922年10月號的《La Verda Ombro》，也可見連溫卿的〈Kontraŭmodulo kaj Perfidanto〉（反叛者與叛徒）一文，除了宣傳世界語的重要性，也對殖民地政策提出指控：

過去幾世紀以來，各強國的殖民地政策以將從屬國的民眾加以同化為目標，他們相信只要在殖民地普及語言，同化政策就能達到極大積效。……然而，相反地，世界大戰之後，如此缺乏思慮的想法，已從世界潮流中如春之雪崩一般消失殆盡。而作為其反動的世界語則正擴大流行。……因為站在自由與平等之上所創案出來的世界語，才是最能完全表現新時代精神的。²⁶

24 譯文轉引自胡愈之譯，《枯葉雜記及其他》，頁6-7。

25 高杉一郎，〈あとがき〉，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エンコ全集Ⅱ》（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09-11），頁411。

26 Lepismo（連溫卿），〈Kontraŭmodulo kaj Perfidanto〉（反叛者與叛徒），《La Verda Ombro》第4年第8號（1922.10），頁3-4（原文為世界語，筆者中譯）。

也就是說，日本及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如此致力於世界語運動的原因之一在於，他們認為世界語才能完全表現新時代的精神；而作為殖民地人民的連溫卿將愛羅先珂作品刊載到《La Verda Ombro》，則也是因為對於愛氏向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社會發出憤怒的書寫感到共鳴。

四、〈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

《La Verda Ombro》於1923年2月出版當期雜誌之單行本附錄〈Unu Paĝeto en Mia Lerneja Vivo〉（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這篇亦可謂愛羅先珂「自敘傳」的作品，描述作者自身從4歲失明之後就不斷經歷著「黑暗」，而在9歲時前往莫斯科盲人學校就讀後，開啟了另一段感知世界的旅程。此文於1922年7月已由胡愈之中譯，並收錄於魯迅、馥泉等人翻譯出版的《愛羅先珂童話集》。²⁷ 而其世界語原文亦收錄於1923年《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因此，〈童話寫生〉和〈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的世界語原文於《La Verda Ombro》刊出，但也於1923年在中國都發表過。

但此由《La Verda Ombro》出版的單行本之封底，則有主編連溫卿以世界語附註的文字，謂此世界語原稿乃從「Sro S. Higa」之處得來，其日譯版已刊於日本雜誌《La Ni》（即《我等》），而此單行本則僅刊世界語原文，並附上一些日文註釋。此「Sro S. Higa」即是比嘉春潮。沖繩出身的比嘉於1916年為參加台灣勸業共進會而來到台灣，並在台北訪問世界語者蘇璧輝，在蘇的力勸下開始於沖繩從事世界語運動。²⁸ 比嘉上京後任職《改造》雜誌社記者，在1927年時則參與成立一個閱讀國際的左翼世界語團體「SAT」發行的雜誌《Sennaciulo（無民族者／無國籍者）》的世界語研究會，名為「柏木ロンド」，而這個研究會後來被視為日本世界語運動轉向「普羅世界語」運動

27 愛羅先珂著，魯迅等譯，《愛羅先珂童話集》（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07）、《魯迅全集12》（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頁289；中亦有相關說明。

28 比嘉春潮，〈琉球の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回顧〉，《La Revuo Orienta（東方評論）》（日本東京：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學會，1936.06），頁75-76。另可參考比嘉春潮，〈沖繩の歲月 自伝的回想から〉（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12），頁134（但該書將1916年的博覽會誤記為「始政四十年記念博覽會」，應是「台灣勸業共進會」）。

的一個前哨團體。²⁹連溫卿在1924年旅行日本時，曾留下日記〈蠹魚的旅行日記〉，³⁰旅行期間拜訪了幾位社會主義者，其中一人即是比嘉，甚且連溫卿所訪之台人及日人，皆為世界語者。³¹

透過世界語者之間的連結，我們可理出愛羅先珂〈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於日、台、中的刊載路徑；即當時滯留中國期間的愛羅先珂，在寫完世界語原文時，將原稿交付胡愈之，並且由其中譯後刊於中國的報章雜誌，而中譯版收於《愛羅先珂童話集》，世界語版則收於《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但同時交給比嘉春潮，比嘉將日譯版刊於《我等》並把原文版交給連溫卿，連即直接將原文刊於《La Verda Ombro》。

值得一提的是，此〈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筆者考察了另一個有趣的傳播途徑，即這篇作品很快地於1924年被以廈門語羅馬字加以翻譯，收錄於當時台灣人亦可購讀的《廈語短篇小說》第一集。而於譯者的後註裡有如下說明。

這篇小說是伊家己寫的傳。佇中國的時為著上海民國日報來寫的。胡愈之先生替伊翻譯作中文，後來魯迅先生編輯伊的作品作一本冊，名叫《愛羅先珂童話集》，有用這篇作頭一篇。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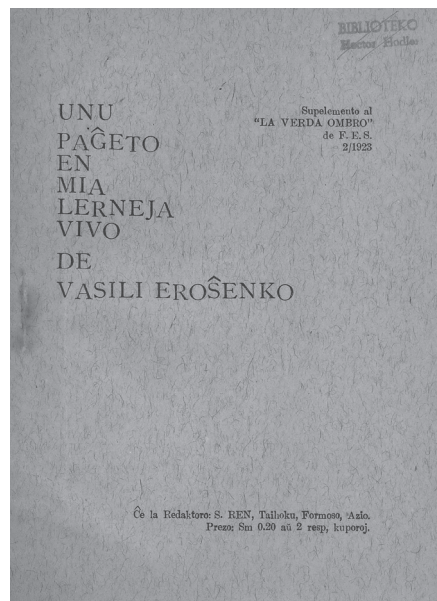


圖3 〈Unu Paĝeto en Mia Lernejo vivo〉（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La Verda Ombro》1923年1、2月號附錄單行本封面。

29 竹内次郎，《プロレタリア・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に付て》思想研究資料特第69號（日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社，1939.11），頁151-152。

30 連溫卿於1924年將其〈蠹魚的旅行日記〉發表於中國發行的新聞，共105回連載。請參考戴國輝校訂，〈連溫卿日記——1930年の33日間〉，《史苑》39卷1期（1978.11），頁99。

31 請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台灣世界語運動的開展與連溫卿〉，陳翠蓮等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五集，頁154-155。

32 廈語社，《廈語短篇小說》第一集（中國廈門：廈語社，1922），頁28（原文為教會羅馬字，筆者漢譯）。此書現收藏於台灣文學館。

由此可知，此作品原是受《上海民國日報》所託而寫。³³也就是說，愛羅先珂的原文稿件完成後，除了交給胡愈之，也同時寄給比嘉春潮，比嘉也再轉交連溫卿，讓他率先刊於《La Verda Ombro》。而發行此羅馬字讀本的廈語社，其出版的刊物書籍於閩南、台灣、菲律賓、新加坡、南洋群島等諸多通行廈門話之地。³⁴

以發行時間來看，〈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中譯版收於中國在1922年出版的《愛羅先珂童話集》，而最早於台灣傳播的途徑即：1923年由《La Verda Ombro》出版的世界語單行本；再來是1924年的廈門語羅馬字版本，然後才是1925年7月連載於《台灣民報》的中譯版（轉載胡愈之所譯）。³⁵葉榮鐘藏書中的《愛羅先珂童話集》，則是1925年的再版版本；而賴和紀念館館藏的由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作品集《世界的火災》及《愛羅先珂童話集》，都是1924年12月發行的版本。總之，可以說愛羅先珂童話在台灣傳播，最早就是世界語，再來是廈門語／台灣語，最後才是中國語。

五、〈為了跌下而造的塔〉

《La Verda Ombro》於1923年7月又以單行本附錄形式，出版另一部愛羅先珂作品《Toro por Fali》（為了跌下而造的塔）。單行本內除了世界語原文之外，且附有日文翻譯，編者連溫卿在文末註明日譯乃轉自《解放》雜誌5月號。《解放》和前述的《改造》都是當時在日本極具影響力的左翼雜誌，雜誌中也不時刊出世界語相關文章；而連溫卿的世界語連結，包括他旅日時所見的，也幾乎都是較左翼的世界語者，可以說，此時的《La Verda Ombro》即已明顯左傾，它連結的中國或日本知識圈也多以左翼為主。而〈為了跌下而造的塔〉是一篇極具現代主義手法技巧的文本，明白地批判了多數青年窮極一生就為了建造一棟虛幻的「空中閣樓」，其目的說穿了，就是從自己建造的高塔上跌下來，而這也暗喻地諷刺了中國內部軍閥各自陣營相互對立抗爭的情況。

33 筆者翻閱《上海民國日報》，卻未見〈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一文，但該報的相關雜誌如《覺悟民國日報》或《晨報副鐫》等，於1921年即刊載許多愛羅先珂的相關介紹及其作品。

34 廈語社，《廈語短篇小說》第一集，封底。

35 愛羅先珂著，胡愈之譯，〈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台灣民報》（1925.07.01、1925.07.12）。

據愛羅先珂研究者高杉一郎於其編譯的《エロシェンコ童話集》所言，書中收錄的〈おちるための塔〉（〈為跌下而造的塔〉日語版），其世界語原文即出自連溫卿編輯的《La Verda Ombro》，而此日語譯文則原是高杉從前向連溫卿摯友比嘉春潮借來的發表刊物（按：應就是《解放》）所抄來的筆記並修改的。³⁶ 倒是，在《La Verda Ombro》刊出此文之前，中國已有胡愈之的中譯版刊於1922年1月的《東方雜誌》；³⁷ 胡愈之也於譯文中註明此篇乃愛羅先珂為本誌特著的世界語童話。那麼，此〈為跌下而造的塔〉應與〈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的途徑雷同，即愛羅先珂將世界語原文完成後，除了交付胡愈之，由其中譯後介紹給中國，同時愛氏也將原稿寄予比嘉春潮，比嘉將日譯版刊於《我等》及《解放》，並把原稿也交給連溫卿刊於《La Verda Ombro》。所以，愛羅先珂的世界語作品，幾乎在同時間內被譯為日文及中文，而這在當時的中日文壇裡應是極為罕見的。

魯迅在《愛羅先珂童話集》序裡提及：「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敘傳和為跌下而造的塔是由胡愈之先生譯的。」³⁸ 其中，〈自敘傳〉即前述〈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而〈為跌下而造的塔〉即是《La Verda Ombro》中的《Toro por Fali》。於上海出版的愛氏世界語創作集《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並未收入此篇，而高杉一郎所編輯的年表，此篇的出處亦是《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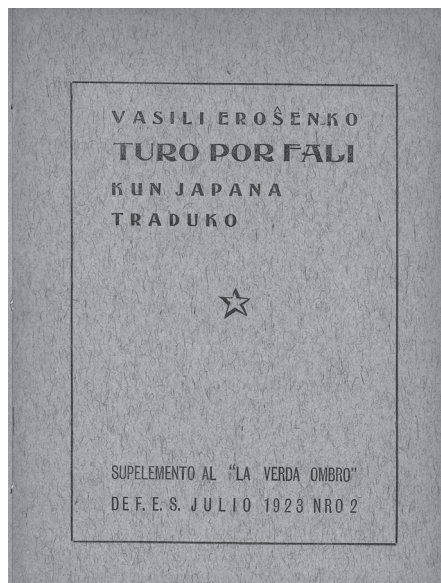


圖4 〈Toro por Fali〉（為跌下而造的塔），《La Verda Ombro》1923年6、7月號附錄單行本封面。

36 高杉一郎編譯，《エロシェンコ童話集》，頁224。

37 愛羅先珂著，愉之譯，〈為跌下而造的塔〉，《東方雜誌》19卷1期（1922.01），頁125-130。

38 愛羅先珂著，魯迅等譯《愛羅先珂童話集》，頁1。《魯迅全集12》（頁289）中，亦附有當時（1922.01.28）的序文。但因〈自敘傳〉與〈為跌下而造的塔〉非魯迅所譯，故未收錄於全集。

Verda Ombro》。³⁹ 換句話說，此文的世界語原文的最早刊登之處，即是台灣世界語學會的機關雜誌。

六、愛羅先珂作品的著作權「糾紛」

如前述所言，連溫卿曾謂《La Verda Ombro》因刊出愛羅先珂作品而與胡愈之發生著作權糾紛，後來透過《讀者文摘》主編福岡誠一出面調停。福岡誠一也是一位世界語者，在仍是東大學生的時代，即愛氏滯留北京期間，就曾前往北京並客宿魯迅住家，與愛羅先珂相處長達3週，⁴⁰ 甚且對正在翻譯愛氏戲曲《桃色的雲》的魯迅提出建議。⁴¹ 因此，福岡應是最了解愛羅先珂及其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之一。著作權的糾紛問題，連溫卿並未詳述糾紛過程，而研究者松田はるひ則認為起因在於〈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的刊載。⁴² 但從高杉一郎的考察可知，愛氏預計於日本出版的第3部創作集《人類的為めに》，原是1922年已由改造社籌備好出版作業，卻因關東大地震導致火燒，僅留下部分校訂稿；因此1924年10月才再交由東京刊行社出版，福岡誠一即是當時的編輯；而〈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與〈為跌下而造的塔〉亦收於《人類的為めに》（為了人類）一書。⁴³ 由此即可知，為何著作權糾紛需要福岡誠一才能得到解決；且不僅是〈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為跌下而造的塔〉也是版權問題糾紛的肇因之一。

更詳細地說，胡愈之的中譯版〈童話寫生〉、〈為跌下而造的塔〉，刊出時間都早於《La Verda Ombro》，尤其〈枯葉雜記（童話寫生）〉與〈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皆收於胡所編集之愛氏世界語作品集《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個孤獨靈魂的呻吟）。亦即，《La Verda Ombro》中的3篇愛羅先珂作品原文，在台灣的世界語雜誌刊出前，早已於中國被介紹過，即便〈為

39 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ェンコ全集Ⅲ》，頁276。

40 福岡誠一，〈北京のエロシェンコ〉，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ェンコ全集Ⅱ》（附於《エロシェンコ全集Ⅰ》）（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09），頁1。

41 ア・ハリコウスキー著，山本直人譯，《盲目の詩人 エロシェンコ》（日本東京：桓文社，1983.09），頁319。

42 松田はるひ，〈緑の蔭で——植民地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4）〉，《La Revuo Orienta》（1977.09）第45年第9號，頁13。

43 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ェンコ全集Ⅲ》（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11），頁275。

跌下而造的塔〉的介紹猶僅為中譯版。換句話說，胡與連的著作權糾紛，此3篇作品恐怕都是糾紛肇因。而〈為跌下而造的塔〉乃愛羅先珂為《東方雜誌》所寫，原題為「La Rakonto de Suda Kaj Noruda」（南與北的故事），經譯者胡愈之與作者討論才改題，⁴⁴ 因此或許可說，此篇是糾紛的最大肇因。

七、小結

本文以俄國作家愛羅先珂刊在台灣世界語學會機關雜誌《La Verda Ombro》（綠蔭）的〈童話寫生〉、〈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與〈為跌下而造的塔〉3篇作品為主軸，論析愛氏作品在台灣之傳播途徑。透過本文的考察可知，受日本與中國作家喜愛的愛羅先珂作品，於台灣最早發表的刊物即是《La Verda Ombro》；若以語文區分，則最先是透過世界語，再則為廈門語／台灣語，最後才是《台灣民報》上的中譯版轉載。⁴⁵ 當然，1924年台灣文化協會設置讀報社，其中也輸入不少來自中國的新聞雜誌，⁴⁶ 但以上介紹的3篇作品，皆已在1922年及1923年即刊於《La Verda Ombro》，這份當時已在全世界不少世界語者之間流通的雜誌。而藉由分析愛氏作品於台、中、日的刊載，以及著作權的糾紛過程，我們也能從中理解到世界語者之間極其緊密的網絡關係，成為1920年代初期的東亞知識分子交流的一個重要管道。

甚且，愛羅先珂的這些作品，正如胡愈之所言，其實都是保有童心的愛羅先珂所創作出的「童話體作品」，尤其〈枯葉雜記（童話寫生）〉的體裁可說是完全獨創的，且在近代文學上很難找到相同的形式，從大體看來，竟可謂長篇的散文詩。⁴⁷ 像愛羅先珂的作品這樣，一發表就幾乎在同時間內以幾種語文流通於日本、中國與台灣，這在當時的東亞文壇中應是相當稀少的。而除了《La Verda Ombro》刊出愛羅先珂作品，如前文提及從賴和、葉榮鐘的藏書，或者台灣文學館館藏也可略知，無論是世界語原文或者中文、教會羅馬字的翻

44 愛羅先珂著，愉之譯，〈為跌下而造的塔〉，《東方雜誌》19卷1期（1922.01），頁123、129。

45 《台灣民報》先刊登了魯迅懷念愛羅先珂所寫的作品〈鴨的喜劇〉（1925.01.01），之後再轉載〈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1925.07.01、07.12）與〈狹的籠〉（1925.09.06、09.13、09.20、10.04）2篇愛氏作品。

46 〈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台灣民報》（1924.10.01），12版。

47 愛羅先珂著，愉之譯，〈枯葉雜記〉，《東方雜誌》19卷5-6期（1922.03.10），頁114。

譯，愛羅先珂的作品被台灣作家看見，應該也有不少迴響，這部分待日後再行考察。

而在《台灣民報》獲總督府許可於1927年移至島內發刊之前，由台灣世界言學會發行長達5、6年，且成為當時世界知名雜誌的《La Verda Ombro》，可謂由台灣人發行、編輯、執筆，且站在批判殖民主義立場的一份重要雜誌。其內容介紹國際情勢、世界各國的世界語運動之外，也以世界語將台灣的歷史、文化、民族的特殊性，甚至是社會政治現狀等等傳播至世界，此重要意義理應更加被著墨於史書。而就台灣文學的意義而言，《La Verda Ombro》中的〈台灣原住民傳說〉或台灣民間文學的譯介，也代表台灣文學外譯的一個重要起點。另一方面，《La Verda Ombro》轉載或刊登許多著名的世界文學作品，除了歐美文學之外，俄國文學、普羅文學等等，其中刊出的愛羅先珂作品之世界語原文，除了可見當時的台灣世界語者對世界潮流與東亞脈動的觀察之敏銳，也流露了編者如連溫卿，與日本及中國進步知識作家有著類似的，對於俄國及當時代左翼思潮與文藝的憧憬。這些作品的刊載與其意義，也應在台灣文學史上記上一筆。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比嘉春潮，《沖縄の歲月 自伝的回想から》（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12）。

竹内次郎，《プロレタリア・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に付て》思想研究資料特第69號（日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社，1939.11）。

侯志平主編，《中國世界語運動簡史》（世界語及簡體字漢語對照版）（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4.07）。

高杉一郎編，《エロシェンコ全集Ⅰ～Ⅲ》（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09-11）。

——，《夜あけ前の歌——盲目詩人エロシェンコの生涯》（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2.12）。

高杉一郎編譯，《エロシェンコ童話集》（日本東京：偕成社，1993.11）。

許素蘭主編，《挖掘・研究・再現——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9）。

——，《經眼・辨析・苦行——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三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07）。

陳翠蓮等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五集（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3.08）。

黃尊生，《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中國天津：啟明書社，1935.05）

廈語社，《廈語短篇小說》第一集（中國廈門：廈語社，1922）。

愛羅先珂著，胡愈之譯，《枯葉雜記及其他》（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04）。

——，魯迅等譯，《愛羅先珂童話集》（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07）。

魯迅，《魯迅全集12》（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

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 一九二〇年代 東京・上海・北京》（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89.04）。

ア・ハリコウスキー著，山本直人譯，《盲目の詩人 エロシェンコ》（日本東京：桓文社，1983.09）。

Ulrich LINS原著，栗栖繼譯，《危険な言語——迫害のなかのエスペラン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75.11）。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La Verda Ombro》（綠蔭）

《Informo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

《La Revuo Orienta》（東方評論）

《我等》

《解放》

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台灣ESP學會〉，《台北文物》3卷1號（1954.05），頁91-93。

松田はるひ，〈緑の蔭で——植民地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4）〉，《La Revuo Orienta（東方評論）》第45年第9號（1977.09），頁13。

連溫卿，〈台灣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1號（1931.12），頁11。

——，〈日據時期台灣ESP運動〉，《台灣風物》17卷4期（1967.08），頁53。

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政大中文學報》7期（2007.06），頁153-182。

愛羅先珂著，愉之（胡愈之）譯，〈枯葉雜記〉，《東方雜誌》19卷5-6期（1922.03），頁114。

——，〈為跌下而造的塔〉，《東方雜誌》19卷1期（1922.01），頁125-130。

戴國輝校訂，〈連溫卿日記——1930年の33日間〉，《史苑》39卷1期（1978.11），頁79-99。

Lepismo（連溫卿），〈Kontra modulo kaj Perfidanto〉（反叛者與叛徒），《La Verda Ombro》第4年第8號（1922.10），頁3-4。

（二）學位論文

呂美親，〈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 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科博士論文，2016）。

三、報紙文章

〈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台灣民報》（1924.10.01），12版。

《廣州民國日報》

愛羅先珂著，胡愈之譯，〈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台灣民報》（1925.07.01、1925.07.12）。

裏川大無，〈台灣雜誌興亡史（一～九）〉，《台灣時報》（1935.02-12）。

